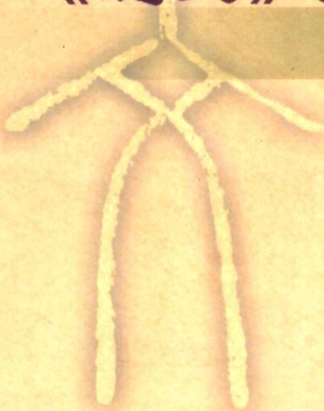


说文

20 世纪 《说文》学流别考论

◆ 张 标 著 ◆



中华书局

20 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

张 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张标著.—北京:中华书局,2003

ISBN 7-101-03839-5

I.2… II.张… III.说文—研究—流派—中国—20世纪 IV.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955 号

责任编辑:陈虎

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

张标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2 1/4印张·278千字

2003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20.00元

ISBN 7-101-03839-5/K·1597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

——阮元

国学的再一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诞生。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国学，
在燕园悄然兴起》编者按语

目 录

绪 论	1
前编 现代《说文》学的前期(1900—1949)	11
第一章 超越前代的传统派	15
第一节 正确认识、评价章黄	15
第二节 章氏《说文》研究的特色	17
第三节 黄侃对章氏《说文》学的继承和发展	25
第四节 章黄学派的历史贡献	27
第五节 造就章黄《说文》学的根本原因	29
第六节 章黄《说文》学可商榷之处	31
第二章 继起的章黄弟子	35
第一节 吴承仕(1884—1939)	35
第二节 钱玄同(1886—1939)	38
第三节 沈兼士(1886—1947)	41
第三章 独辟蹊径的今证派	47
第一节 王懿荣(1845—1900)	49
第二节 孙诒让(1848—1908)	51
第三节 罗振玉(1866—1940)	54
第四节 王国维(1877—1927)	56
第五节 郭沫若(1892—1978)	60
第四章 异军突起的纂集派	62

第一节 《诂林》编纂的起因·····	62
第二节 《诂林》编纂的特色·····	63
第三节 《诂林》编纂的价值·····	66
第四节 《诂林》的不足·····	66
第五节 《诂林》的影响和研究·····	68
第六节 丁氏的其他著述·····	69
第五章 卓蹠出人的会通派·····	72
第一节 杨氏的主要论著·····	72
第二节 杨氏研究《说文》的方法·····	74
第三节 杨氏《说文》学的主要贡献·····	77
第四节 杨氏《说文》学的不足·····	82
第五节 杨氏学的研究·····	84
第六章 发展前进的六书疏证派·····	87
第一节 马氏写作《疏证》的缘起·····	87
第二节 马氏《疏证》的成就与特色·····	90
第三节 马氏《疏证》的成功经验·····	95
第四节 马氏《疏证》的不足·····	97
第五节 马氏《疏证》的影响及其他著述·····	99
第七章 其他诸家·····	102
第一节 传统字源派·····	102
第二节 重建六书派·····	107
第三节 《说文》学史派·····	113
第四节 其他研究·····	117
本编小结·····	124
后编 现代《说文》学发展时期(1949—2000)·····	129
第一章 述中有作的新传统派·····	132

第一节 陆王之学——章黄学统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	132
第二节 陆王的主要著述·····	133
第三节 陆王的研究方法·····	135
第四节 陆王之学的主要贡献·····	139
第五节 陆王之学的成因·····	147
第六节 陆王之学的可商榷处·····	149
第二章 陆氏的同门及门下弟子·····	152
第一节 陆氏重要的师兄弟·····	152
第二节 陆氏弟子及再传弟子·····	160
第三章 由事及理的新综述派·····	174
第一节 理法型·····	174
第二节 教材型·····	189
第四章 努力登攀的新注疏派·····	201
第五章 独树大纛的新文化派·····	212
第六章 后出转精的新古文字学派·····	225
第七章 推陈出新的新词汇派·····	238
第八章 不断创新的新六书派·····	249
第九章 后来居上的新段注派·····	261
第十章 其他研究·····	280
第一节 形体研究·····	280
第二节 徐锴、戴侗研究·····	288
第三节 部首、学术史等·····	299
本编小结·····	323
全书结语·····	327

绪 论

历史已告别了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20 世纪是伟大的世纪。在这 100 年中,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增长,科学的进步,艺术的繁荣,整个社会的发展,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1]。同样,《说文》研究,《说文》学,这个传统国学的重题,可以说取得了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卓越成就,出现了继有清以四大家为代表的《说文》研究高峰之后又一个新的高峰。因此,当 21 世纪到来之际,回顾总结 20 世纪《说文》学的情况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本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

《说文》是中外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字学巨著,在研究《说文》基础上形成的《说文》学居于我国传统小学的核心地位,在《说文》学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说文》学史是推动《说文》学发展的有力工具。《说文》学史隶属于《说文》学,是《说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对《说文》学史的研究,不仅具有光大《说文》学、弘扬民族文化和国学的一般意义,而且具有认识《说文》学发展规律,推动它在下一世纪更自觉、健康、深入发展,取得超越 20 世纪成就的特殊意义;不仅具有充实汉语言文字学内容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拓展《说文》研究视野、推进《说文》研究层次、改进《说文》研究方法、加强《说文》研究学术交流、促进《说文》研究精品的产生和大家的出现、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等实践意义。为此,我们选定本课题。

本课题属于学术史研究范畴。我国学术，一向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把它看作是促进学术交流、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方法。早在西汉，刘歆就完成了先秦至汉的目录学专著《七略》，该书已具学术史之雏型。近代西学东渐，学者以会通交融的方法治学，学术史类专著勃兴，仅民国30余年中伴随“国学热”产生的就有数十种，其著名者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等，其中不乏学术经典，足见其功用和影响。

《说文》学术史研究，是对《说文》研究流派、著述、方法、源流演变、利弊得失进行的回顾和总结。在20世纪以前，此类研究并未系统进行，只是零星散见于相关著述，如史乘中《经籍志》、《艺文志》以及《四库提要》、嘉庆时谢启昆《小学考》等，处于前科学状态。到20世纪，才开始科学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两类著述：一类是通史性研究，一类是断代史性研究。这两类著述又各分两种，一种是《说文》专题研究型，一种是寄附于相关学科型，都有一定成果。属于通史类、《说文》专题研究型的，以黄侃《说文略说·论自汉迄宋为说文之学者》为代表；属于通史类、寄附于相关学科型的，以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为代表。属于断代史类的成果更多些，择要类列于下。

《说文》专题研究型：

①钱基博《近五十年许慎说文学流别考论》，《清华周刊》1925年24卷11期。

②李先华《清代以前〈说文〉流传与研究述略》，《安徽师大学报》1989年2期。

③李建国《论许学的中兴和发展》，载《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④常耀华《许学研究综述》，《辞书研究》1993年4期。

⑤董莲池《十五年来说文解字研究述评》，《松辽学刊》1994年3期。

⑥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⑦班吉庆《建国50年来的说文解字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5期。

寄附于相关学科型：

①郑师许《近三十年来中国治文字学者的派别及方法》，《学艺》1933年12卷1期。

②陈旦《清儒治文字学之派别及其方法述略》，《国学丛刊》1923年1卷2期。

③裘锡圭《40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语文建设》1989年3期。

④向光中《古汉语文字学述评》，载《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⑤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另外，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了一些对20世纪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总结性著述，如裘锡圭、沈培的《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1998)、严修的《二十世纪的古汉语研究》(2001)等。以上著述，虽以20世纪为题，内中也有《说文》研究内容，但或为篇幅所限，或为课题所拘，均未能对20世纪《说文》学进行全面、详尽的专题研究，本课题研究即具有在这方面踵事增华、拾遗补阙之作用。

本题课是《说文》学断代史研究课题。起讫时间是1901至2000年，凡在此时段内有关《说文》研究学者、公私论(论文)著(专著)，均在研究范围之内。其有跨世纪重要学者或某些重要论著，则略微放宽，不严格受时间限制。

本课题以流派为重点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学术派别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古今都有。《汉书·艺文志》就以学派统领著述;今人王力讲到旧训诂学时就以纂集派、注释派、发明派相区别^[2],蒋善国将历代研究《说文》的学者归作校勘派、正字派、会意派、六书派、注疏派、声系派、通假派、释例派、语源派、专题派、古文字派等11派^[3]。二是讲师承是清代学术发达的原因之一。师徒递相传承,有利于学术的继承和发展^[4]。乾嘉时代除北京以外,江南地区之所以也成为声音文字训诂学的中心,“除了经济发达这个基本条件之外,就文化本身而言,最关重要的有两条:师承和图书”^[5]。三是当代学者认为学派存在的积极意义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试看王宁的论述:

中国传统的人文科学在学术研究上是重师承的,不同的学术渊源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不同的方法特色和不同的研究切入点。有人把这种特色称作“学派”,认为那是一种封建意识。其实,人文科学的研究本来就可以有因为研究思路的关注的中心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切入点,这对科学研究是有好处的,怕的是没有思路和找不到切入点。坚守师承是要继承那些一代代传衍积淀下来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特色,一旦把这些丢掉了,放弃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必然使研究变得无根。坚守师承不等于抱残守缺,而要随时发现不足,勇于改进;坚守师承不等于排斥异己,而要尊重别人,勇于学习。只要有一个现代化的学术互补、殊途同归的精神,“学派”的共存对学术的繁荣是会有促进作用的。^[6]

四是有利于讲清学统、学理、学术体系内在的联系和发展,而不受孤立的著述和固定时空的局限。学派的认定和区分,也有不少具体问题。比如按师承划分,有的所事非一;按研究对象、方法、风格

划分,有的也有跨类交叉现象。对此我们采用以下处理方法:即据主要师承和代表性著作来划分;一位学者原则上有一个基本学派,酌情可兼跨其它学派;有特色、影响大的著述可自立学派。其实跨学派的现象,《汉书·艺文志》早已有之。成就大的学者,往往不为一个学派所拘。需要强调指出,我们以流派为切入点,是沿用传统作法,是从积极方面去考虑的。流派的负面影响,就是唯我独尊、党同伐异、自我封闭;^[7]或者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师承如变为门户,学派如变成了宗派,这都是一种堕落,是不治之症。”^[8]我们应当竭力避免这种消极影响。须知,一个成就卓著的大学者,如果沾染上此种陋习,学术品格也是不健全的。

学派的评鹭,我们坚持三个原则:一是首创价值,也即辨明其在学统中“源”的地位;二是传承价值,也即辨明其在学术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承”的角度看,它是“流”;从“传”的角度看,继承中有发展,它又成为新的“源”,学术就在由源而流、源流交互作用、递相转化中发展。三是精髓价值,即研究对象的高难深广。首创、传承、精髓三者不是对等地位,以首创价值和精髓价值最为重要,此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大师级学者往往集二者于一身。对具有时代象征的流派和著述,我们多施笔墨,力图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其基本面貌及其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力图总结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资借鉴。评价必然谈到不足,我们不采取为尊者讳、为贤者避的态度,赞成梁启超所总结的清代朴学学风,即“所见不合,则相辩诘”的态度^[9]。我们相信,我们以真诚、虚心求教的态度谈出自己的一孔之见,是会得到前辈时贤的理解的。

本课题研究对象的主题中包括有《说文》学。《说文》学与《说文》是密切相关又有区别的概念。《说文》是指许慎撰写的文字学著述自身,包括体例、部首、解说、六书、版本等等,就其内容的博大

精深和所构成的学术体系而言,它是足够称得上一家之“学”而当之无愧的;但是这个《说文》学实际上是《说文》的代名词或换用语,不同于一般使用的《说文》学之称。通常所谓《说文》学,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对《说文》本体、以及以本体为中心外向型研究的成果;②对《说文》研究诸家诸派的再研究成果;③存在于相关学科或著述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说文》研究成果。本课题宗旨是对《说文》学的定时考察、评述,所以《说文》本身以及一切不根于《说文》、远离《说文》而没有什么影响的成果也就不予评说。

与《说文》和《说文》学相对应的一组概念是许书和许学。通常人们把《说文》称作许书,把《说文》学称作许学,是有其道理、无可指责、一般也不会发生概念上的混骰的。但是严格推究,“许书”这个概念远不如《说文》明确。因为“许”氏写的“书”,不只《说文》一种,不加说明的使用“许书”一语,难免使人想到《说文》之外许慎别的著述。因此,为准确起见,本书除了迫不得已沿用前人之称用“许书”外,一般称《说文》。许书这一概念的情况如此,“许学”之称也存在着同样的弊端,所以也同样处理。

《说文》学与文字学,是密切相关而有区别的学科。文字学是以研究文字的性质、特点、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主要任务的学科,《说文》学隶属于文字学,它以研究古代文字学的代表作或奠基作《说文》作为自己的主要对象。基于以上认识,本课题在确定研究素材时,注意划分《说文》学与文字学研究成果的界限,舍弃与《说文》研究关系不密切的文字学类著述,选取那些以《说文》为中心命题并展开论述的成果。至于一般文字学著作中对《说文》有较长篇幅、重要价值的专门论述,或提出影响较大的重要观点,我们一般采取如下处理办法:①在相关流派或专论中评述;②附录著述名称于相关论述之下。

《说文》学与训诂学也是密切相关而又有区别的学科。训诂学以研究语义规律和释义方法为任务,《说文》是训诂第一要籍,训诂学内容中自然少不了《说文》,但训诂学的概括是泛《说文》的,决不同于《说文》学。所以处理训诂学类著作,大体上同于处理文字学类著述的方法,即依据其与《说文》学关系远近、影响大小而酌情处理。

《说文》学与古文字学也是密切相关而又有区别的学科。“古文字学,就是关于古文字及用古文字来记录的文献资料的学问。这门学问既要研究古文字的起源、性质、结构、演变以及考释方法,又要在考释古文字的基础上,解读相关的各种出土文献,并揭示这些文献的历史文化的奥秘。”^[10]《说文》学与古文字学的密切关系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说文》本书就是对古、籀、篆等古文字研究的专书,另一方面是释读古文字离不开《说文》。但是《说文》学是以书面上、许慎用古文字写定的《说文》为研究对象,与以出土古文字、古文献为主要研究任务的古文字学显然不同。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处理古文字学论著时也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方法:旨在对《说文》匡正补苴的,作为《说文》研究成果处理;旨在考释古文字,以《说文》为武器进行的,视作《说文》研究的间接成果。对某些考释古文字做出特殊历史贡献的古文字学家,由于他们的成功系以《说文》为本,作为《说文》研究的“特例”适当予以记载评述。

《说文》学与《说文》学史也密切相关而不同。《说文》学是“论”,是平面研究,追求精深;《说文》学史是“史”,是纵向贯通,捕捉学轨。《说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说文》本体及若干外向型课题,一般是《说文》研究第一产品;《说文》学史是对《说文》研究成果的纵横交错的比较、分析、综合,是《说文》研究的辅助必要产品。《说文》学不以广泛占有材料为必备条件,《说文》学史离不开广泛

占有材料。《说文》学要创造自家观点,看重“新”,《说文》学史评述各家观点,看重“准”。《说文》学给人的是学识,《说文》学史给人的是学理。《说文》学推动该学科的发展是原发的、直接的,《说文》学史推动该学科的发展是自觉的、间接的。《说文》学的开展是随时的,《说文》学史的开展则有时间限制,是后《说文》学之研究。

写学术史坚持的原则,学者谈到下面一些:坚持唯物辩证法;充分占有材料;秉笔直书;对重要原著的介绍,力求有血有肉等。^[11]这确是中肯的经验之谈,我们恪守遵循。根据我们的实践,还有以下补充:疏通学统,辨明源流;从“学”的角度论其贡献,从“史”的角度定其价值;详于重点,略于一般,详于现当代,略于近代。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大体是以20世纪中叶为界,分成两个时期来叙述的,有些作品或作者正好跨越两半叶,对此我们依据他的代表作发表时间来确定归属于什么时期。比如唐兰的突出贡献是“三书”说,“三书”的提出是在30年代,我们就放在上半叶评叙。再如杨树达,他的语源研究的绝大多数论文写作并发表于上半叶,我们从学统出发,就放在上半叶评述。杨氏的有些著述是下半叶出版,我们就算作出版业绩,在下半叶适当提及。马叙伦的情况也差不多。马氏自称其《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创始于1911年,毕业于1928年,该书的创作主旨和思路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文字之原流及研究方法之新倾向》一文中已充分得以展现,我们也是着眼于学统,置诸上半叶。马书1957年才出版,我们也就作为出版业绩叙述。再如郭沫若,他凭借《说文》治古文字的成就主要是在上半叶取得的,而他的重要论文《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是下半叶发表的,我们就在两半叶分别叙述。总之,处理这类问题的总的原则是,顾全大体,因人(事)制宜。

注 释:

- [1]《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总序》，书海出版社(2001)。
- [2]《新训诂学》，《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年)。
- [3]《说文解字讲稿》，语文出版社(1988)。
- [4]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1964)。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 [5][8]何九盈《乾嘉时代的语言学》，《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1期。
- [6]宋永培《说文与上古词义研究·序》，巴蜀书社(2001)。
- [7]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导论·学术史的再认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 [9]《清代学术概论》之十三，见《饮冰室合集》。
- [10]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 [11]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后记》，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